

# 當前中共體制發展的取向

劉清波

## 一、前言

馬克斯設計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，是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基礎上發生的。所以凡是共產主義的國家，政治的體制，經濟的發展，法律的制定，無不都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財產制為中心目標。惟自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復出之後，中共雖然強調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在馬列主義、毛思想指引下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，；健全社會主義法制」，但是在實際的措施上，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的規律，反而成為中國大陸上泛濫的思潮。這種事實，小而言之，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上，顯示出斑斑的瑕疵。大而言之，簡直是污染了馬列主義的純潔性。

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，中共舉行第五屆「全國人代會」第二次會議，通過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」，「擴大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，允許外國公司、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，同中國公司、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，舉辦共同合資企業」（本法第一條參照）。依此規定，則知中共的「經濟改革」，須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或個人相結合，業已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，中共與英國雙方就達成「香港前途協議」舉行草簽，使香港將成為中共統治的大陸中國的「特別行政區」，並且中共同意一九九七年之後，「香港可維持資本主義社會五十年」。中共將此等措施，稱謂「一國兩制」；而且說是根據他們的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

一條的規定而來。

不唯此也，甚至還想藉「香港模式」，解決所謂「台灣問題」，統一中國。此一想像，姑不論有否可能，但是這種形勢的發展，在共產主義的經典和祖宗家法中，確為從來所未有。由此可見，中共現行的「政治體制」與「法制形式」，與其固有的「社會主義本質」不相符合，構成蛻變性的發展。

## 二、開放港口的目的

中共佔據大陸以來，採取閉關自守式的統治政策，使大陸的科技發展落後西方先進國家三十年，人民飽受無盡的痛苦生活。近幾年來，中共改採半掩門似的「門戶開放」政策，彼此交流的結果，於是覺察到自己科技落伍的嚴重性。倘不急起直追，非獨「四化」徒託空言，而且由經濟發展的每下愈況，勢必動搖「無產階級政權」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趙紫陽曾召開一次「高階層座談會」，研究「第三波」產業革命對中共「現代化」的衝擊。在此會議中，趙某公開指出，略稱：「如不利用時機抓緊新科技的成果，中國大陸與先進國家差距的擴大，把『我們』甩得更遠」。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中共「社會學院」副院長宦鄉在北平「經濟日報」上發表長文。他建議中共應不惜任何代價，立即發展電子計算機、生物工程、光纖、激光等尖端科技。同月中共發表評論

，指明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世界科技有重大突破，各國經濟迅速發展，而那時他們却陷入可悲的動亂之中，貽誤時機。八十年代，他們不能坐失良機。

然而，要發展科技，須有經濟的條件。也就是說須有經濟的發展，科學技術方不致用武無地，兩者互為影響，關係非常密切。中共為爭取引進更多外國資本，開發經濟和發展科技，最近，決定加強繼續進行「新經濟政策」，舉行「沿海城市座談會」，公開宣布：「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，為吸收外商投資的經濟開發區」。依此宣布，即知中共意欲借助外來的資本、設備、科技，提升十四個城市的工業化、現代化的程度，從而帶動「沿海地區」的經濟發展。

中共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通過的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」，到目前為止，行將五年，據外電的報導，截至一九八二年，原分設在廣東的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福建的廈門的五個「經濟特區」，工廠企業中外合資者只有四十八家，總投資約二億二千三百萬美元。此外尚有四百二十五家合作生產計劃。也許他們看到了些許利益，所以這一次宣布下列的十四個「港口城市」為港口「經濟開發區」。

十四個「港口城市」為：「遼寧省的大連，河北省的秦皇島，天津直轄市，山東的烟台和青島，江蘇省的連雲港和南通，上海直轄市，浙江省的寧波和溫州，福建省的福州，廣東省的廣州和湛江，以及廣西省的北海。如果把中共稍早所設的四個「經濟特區」合併計算，全部共有十八個「經濟發展特區」。除天津與上海兩處在行政制度上為「中央」的直轄市外，其餘都是省的重要城市。據中共的報導，他們只是在「市」內劃出一區域為外商投資區，把與外商合資、合營、或外商獨資企業、工廠等集中起來，予以「經濟特區」的優惠辦法，以爭取外來的投資，以解決當地就業的困難，企圖實現「先沿海、後內地」，「先城市、後鄉村」的經濟開發政策。

中共雖然宣布沿海十四個「港口城市」為「經濟開發區」，但仍未動工興建。籌建期間約需一年的時間，全面開發時期約在中共的第七個「五年計畫」期間，即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間，這十四個港口發展經濟

的重點為：①發展港口運輸，建立聯運的鐵、公路，增多外運與外銷；②發展農漁產品加工，增強外銷；③拓展貿易、旅遊商業；④發展合資、合營企業，爭取外商獨資經營企業，並引入先進科技，由沿海而內陸；⑤發展科技資訊、開闢港口資訊地帶。

觀之以往史實，人人週知，經濟開發與科學知識的關係密切；而中共領導集團大抵為一群「反知識論」者的結合。非但不注重「智力投資」，亦不重視「知識分子」地位之重要。鄧小平承認：「同發達國家比較，我們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伍了二十年。科技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人，蘇聯有九十萬人，我們只有二萬多人，還包括老、弱、病、殘，真正頂用的不多」。目前大陸一千多萬大專畢業生中，有一半是出身「兩兵」。所謂兩兵，即指一九六六到七〇年畢業的「紅衛兵」和一九七五到八〇年畢業的「工農兵」。不僅政治質量差和業務水準低；而且陷入普遍的「信仰危機」與「知識危機」之中。人才如此凋零，試問如何發展新的「產業革命」？

台灣海峽兩岸，由於政治型態與經濟制度的不同，以及科技知識的修養有別，人民雖都是中國人，但在生活素質上則有天淵之別。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每人一年平均所得超過二千五百美元；而中國大陸人民的所得仍只有二百五十美元左右。物質生活的過分低微，顯有不利於「政治發展」上「國家統合」的理論。中共為了減低國家「統合上的排斥性」，為提昇經濟上的物質生活，為逐漸累積政治上「和談的統一基礎」，現在打著經濟開發的「統戰伎倆」，逕向著我們挑戰。這項改變手法的新招式，值得研究。

### 三、「和平統一」的運作

十月一日是「北京」的「國慶」。外電報導說：這一天舉行「大閱兵」。凡是參加的學生每人發給七角「人民幣」，職工發給一元六角。參加人數之多，為空前所未有，除大遊行，二十多萬軍隊大檢閱、武器大展覽外，並顯示鄧小平路線的大示威。所謂示威，係指向歷史示威，向現實示威，向保守派示威，向左派示威。其重要的目的，「鼓舞愛國情緒，增長四

化志氣，和推動各條戰線工作」。一場大遊行，用掉四十億人民幣，約合二十億美金。因此，北平人說：「鄧小平天安門城樓上一揮手，我們就要白幹一年半」。

又，趙紫陽在「國宴」上發表談話，除特別讚揚與英國草簽「香港前途協議」是一極大的成就，並保證遵守協議外，而且強調：「我們一國兩制的提議，去探求統一是最合理的。我們已準備開始與台灣當局一齊磋商……爲了雙方都接受和平統一方法及早實現」。鄧小平尤其作支撐性的說：「和平統一台灣，有關的政策是衆所周知的，和不會改變的。中國遲早會和平統一，希望各地同胞共同促進這一天」。

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以武力佔據中國大陸以來，企圖解決「台灣問題」的策略，大抵可分爲四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的五十年代，欲乘軍事上之優勢，狂想以武力征服台灣；第二階段的六十年代，因內在的「文革」形成海峽的對峙局面；第三階段的七十年代，國際上雖只有「一個中華民國」，但中共則以「正常化」策略，獲得美國在北平設立「連絡處」，而於一九七八年達成「建交協議」，形成「中華民國」和「中共政權」型態的「兩個中國」。第四階段的八十年代，由於中共與美國已建立正式外交關係，則將「兩個中國」變成了「一個中國」與「一個台灣」。

自「八一七公報」發表之後，中共非但破壞「台灣關係法」不遺餘力，而且欲以非武力「和談」的方式使台灣變爲「地方性政府」，完成「一個中國」的夢想。觀之此種發展的過程，即共產主義「不斷革命論」與「革命階段論」的「實現」。吾人必須洞察其「理論」與「實際」的關聯和運用，提出有效的因應之道。

其次，北平的「大閱兵」，雖然不顧人民生活的艱辛作誇大、鋪張的浪費，和好戰的武力宣傳，爲識者不屑一顧，但另一方面所啓發的「民族感情」與「民族文化」的潛力，對於海外僑胞的「故國心」與國際上「好感」的形象，不無增加新的激素，在敵我長程的鬥爭上，此一「文化統戰」用心，其影響最爲深遠。

面對如此兇惡陰險的敵人，在今後對敵的戰鬥中吾人必須揭穿敵人的詭謀，適當的將統一中國的「目的」與「手段」和「終局」與「過程」清

晰的分開。蓋重建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富強、康樂的一個中國爲目的，爲終局，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，是手段、是過程。在現階段和平競爭的發展中，吾人如何發展此一民主自由的「政治實體」的光輝和力量，突破敵人孤立我們，擊敗敵人對我們「統戰」的新花招，在國際上增進我們國家的權益，則爲絕對不可忽視的目標。

中共最近所以特別宣傳「香港前途談判協議」者，即在以「香港模式」來解決所謂「台灣問題」。趙紫陽、鄧小平在「國慶」上高談收回香港的成就者，即已認定美國與日本爲攏絡中共「反蘇」，對於英國與中共的香港前途協議必然積極的予以支持。所以我們必須密切注意「香港特別行政區」的變化和進行切實的研究，作反制性打擊。

#### 四、經濟體系的改革

中共第十二屆三中全會，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起，在北平舉行。中共政權自從接受南斯拉夫、羅馬尼亞的農業生產的先例，和趙紫陽在四川實施改革的經驗，確立實施「農業生產責任制」，改革農村經濟之後，據大陸透露的消息，一九八三年中共「國營企業」的生產總值爲六、〇八八億「人民幣」，而職工個人平均所得值爲八六五元。①其與農民完成「包產制」後之生產總值與個人所得，比例上的差距甚遠，造成「城鄉經濟矛盾」。②兼以「對內改革」與「對外開放」政策，推行過急，導致「鄧系體制」與「高級頭目」間的矛盾。③又以香港前途協議達成之後，企圖加速推動「統一台灣」陰謀的進行。④同時今年是中共「六個五年計畫」的終點，七個「五年計畫」的起點。根據這一些背景，似爲中共召開此次「全會」的基本因素。

第一、從基礎理論上觀察，大陸上所採取的經濟制度，是「計畫經濟」。由中共「計畫委員會」，一則向地方或企業強制性的收購物資，分配、生產、運輸等；一則下達指導原則，要求受令者遵守，而全然賴「四個堅持」爲穩定政權的理論基礎。此後，如果決定實施「城市經濟改革方案」，解除大部分的經濟管制制度，使市場經濟自由化，此等情形，鄧小平雖迭次聲稱，這是「同中國實際情形結合的馬克斯主義」，是「切合中國實

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。殊不知市場經濟的發展，使資源的運用逐漸脫離政府的管制，走向自由市場的決定。在共產理論體系中，政府所能控制的資源既少，許多預定從事的工作無法進行，產生停滯現象。此項經濟轉變，非但造成政治控制的鬆懈，而必將形成內在的政治危機。

第二、就市場經濟體系上觀察。過去數年，中共在大陸上實施的經濟體系，大抵有二：其一、一部分為市場取向的；其二、大部分為管制的。由於「集權經濟體系」的效率太低，為增進效率，充實生產的誘因，勢必增加人民的消費，和增加人民的生產自主權。如果中共一系列的經濟實驗，將一半上下的農工產品價格管制予以解除，並逐漸減少「政府」對糧食、住宅和交通等基本項目的巨額補助，則由增加效率與政府控制的物資，終必發生衝突，迫使其採取更多的開放措施。

此外中共向來為壓低工資，將人民生活水平維持在最低度，如今若繼續採取補貼政策，即意識到「政府」必須掌握原先應由「市場經濟」所決定的物資，因而增加「政府」的支出，如不放棄「補助」，則通貨膨脹自屬難免，勢將與死硬派的經濟強人陳雲、李先念等發生衝突。

第三、自地方發展上觀察。最近這幾年，中共在地方上作一系列的經濟改革。其最重要的影響，是自農村實施經濟改革之後，城市企業喪失以往在「統購」與「統銷」管制制度下的優勢。原有的農村銷售網路既被破壞，而城市企業又必然自負盈虧的責任，因之將來的經營必更加困難。

此種取向，非但顯示「集體所有制」（一九八二年中共憲法第六條參照）向「私有財產制」讓步，而且「全民所有制」（同條參照）又須向「集體所有制」讓步。此等場合，除在理論上呈現出「全民所有制經濟」與「集體所有制經濟」，亦即「城」與「鄉」的發展不平衡，並使中共各級幹部既得的利益，將遭受重大的傷害，繼之形成中共內部幹部的離心與杯葛和怠慢的問題。

## 五、體制發展的取向

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亡，鄧小平於翌年七月復出，同年八月中共舉行十一屆黨代表大會，此時鄧派的權力業已膨脹，到一九七八年

十二月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時，鄧小平集團便掌握了政權發展的航向。自一九七七年起算，在過去八年之中，吾人觀察大陸的政治發展和經濟取向，除顯示政治權力與經濟策略互為支撐的一致性外，並表現了鄧小平集團求變的努力，而且提出到公元二〇〇〇年時，「工業總產值翻兩番」的最高目標。

中共積極的求變，固然由於毛澤東在過去三十年內，實施馬列共產主義統制經濟的結果，使大陸上近四十萬個大小工業發生浪費、低產、缺乏經濟效益，長期處於虧損的狀態，並且使二萬六千多個公社的人民，由於吃大鍋飯而怠工、毀損、減產，釀成農村經濟的凋敝。因之，鄧小平集團努力求變，在農業發展上實施「包產到戶」，即推行「農業生產責任制」，在經濟發展上實施「改革城市經濟體制」，即解除大部分的經濟管制制度，使市場經濟自由化。這種取向，鄧小平雖解釋為是「切合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但究其本質，非但共產主義的經典中不會有此一章，而且，此等方法，簡直是違反馬列主義的祖宗家法，實際上否定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」，實質上向「資本主義進步的經驗」學步。準此以觀，兩種主義孰優孰劣？從中共求變的「事實法則」中，已經得到答案，不言而喻了。

鄧小平集團努力「制度」的求變，固然是由於毛澤東實施共產主義和馬列思想的專制的結果，同時，也是大陸同胞於飽受無產階級專政之苦之後，中共承受不了大陸整體同胞求變的精神壓力。所以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之初，就提出了「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」。所謂三大任務，即指統一中國、反對霸權、實施四個現代化而言。最近中共的幾項政策性的決定，例如經濟體制的改革，三年的整黨計劃，改革城市經濟體制，開放沿海港口城市，發展特區經濟，以及外資體制的改革等，無不都是遠離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，而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學步。

中共「黨主席」胡耀邦曾說：「黨風不正，人民不滿，改革難行」。鄧小平一系為統十全黨的思想，為貫徹學步資本主義的路線，所以決定自一九八三年十月開始，預定為期三年完成整黨。整黨就是要求全黨學習「鄧小平文選」的思想，宣揚「鄧選」是「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」經典。用

鄧思想壓制理論界的「社會主義異化論」和「人道主義」的主張，以及文藝界的「自由化思想」，徹底否定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教育，制服抗拒改革路線的「老幹部」和軍人「高幹」。把鄧胡趙的「異化體制」穩定，把學習「資本主義經驗」禁根。

雖然中共黨內有些幹部把「經濟特區」視為「自設租界」，或「擴大白區」，實際上宣傳了「資本主義的優越性」；又有若干「幹部」慨嘆「只要港口」，「不要內陸」，和「只要東南」，「不要西北」，但是鄧系集團則認為「特區」帶來了非比平常的經濟發展，刺激生產，增收外匯，有助現代化的發展和成就。可見中共現行「對外開放，對內搞活」的經濟策略，與其堅持的「馬列思想」和「社會主義道路」的路線，已陷於矛盾衝突之中。

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，原分兩大部份，其一、為農村的，其二、為城市的。前者即指農民皆在爭取「包產到戶」，又稱「聯產承包責任制」而言，即將土地分割為小塊，由農民按戶承包，訂定契約合同，除繳征糧、購糧、公積金、社會負擔數量等外，其餘全歸農民所有，有權自行分配，而且約定一包十五年不變。後者，內容甚多，重要者不外：擴大企業自主權，增強其活力；改革計劃體制，運用價值規律，發展商品生產；建立價格體系，重視經濟槓桿作用；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；發展多元經濟形式，擴大對外和對內經濟交流；起用新人，培養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；實行政、企分開，簡政放權，掃除官僚主義等。鄧派的此等經濟體制改

革，理論上雖一再強調為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」，是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事實上，誠如俄共「真理報」所批評，那是「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」，使公社的集體公有制解體，使城市企業制不准民營，則中共標榜的「生產資料公有制」（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六條）全然破壞，那裏還有社會主義的成分？那裡又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？

最後，談到「中國統一」與中國大陸的「現代化」問題。前者以「一國兩制」為「和平統一」的藍圖，以揚言封鎖台灣海峽，為促成統一的「內力」。殊不知鄧小平集團自決定「現代化」政策之後，非獨須鉅大的資金，而且急需先進科學技術，社會主義既無法為之提供，遂向資本主義世界求援。於是民主世界的頭號資本主義國家，皆成為中共今日爭取的最誠摯的「密友」，不惟不能「反」，而且有所「求」。後者，以與美國正常化的關係，只能利用「一國兩制」不能達成統一的矛盾，以之為訛詐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從事「和談」、「停售」、「廢法」的工具罷了。

鄧系「走資路線」的發展，中共左派的急進老幹部，都在瞪著眼兒瞧，鄧派一點兒不敢放鬆，既不敢貿然以武力封鎖台灣海峽，也不敢貿然硬著頭皮「反霸」，他們就在這種「矛盾統一」的法則中摸索。如經濟改革生效，大陸的經濟體制，將逐漸擺脫「史大林模式」的桎梏，向南斯拉夫、匈牙利型的「市場社會主義」模式推進。如果改革失敗，將在這種僵化制度下蹣跚而行，殊難開創現代化的新局面，甚至於一有波折，將有一番天翻地覆的鬪爭和大動亂。

## 地理難題詳解

鄒豹君 著  
定價：九十九元

本書以問答題的方式來分析多種地理難題，全書二十章，五百七十題，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，並從居住環境、國家與國際環境、海與陸、大氣層、太陽系、宇宙等六大層環境中，就切身的實際問題，細加分析。不但解答正確詳盡，且極富趣味性，讀之可認識人類在整個宇宙及地球上之地位及使命，從而激發其創造力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 
郵撥一六五號 電話三一六一八